



馬友蘭文集

龍德

【第三卷】

中国哲学史(下)

ZHONGGUOZHEXUESHI(XIA)

長春出版社

馮友蘭文集

卷三

【第三卷】

中国哲学史(下)

長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哲学史 (下) /冯友兰著; 邵汉明编选.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8.1

(冯友兰文集: 3)

ISBN 978—7—5445—0505—5

I. 中... II. ①冯... ②邵... III. 哲学史—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2433 号

冯友兰文集第三卷：中国哲学史（下）

著 者：冯友兰

编 选：邵汉明

责任编辑：张中良

封面设计：王国擎

版式设计：王久慧

出版发行：长春出版社

总 编 室 电 话：0431—88563443

发行部电话：0431—88561180

读者服务部电话：0431—88561177

地 址：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130061

网 址：www.cccbs.net

制 版：吉林省久慧文化有限公司

印 刷：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开本

字 数：448 千字

印 张：22 印张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 000 册

定 价：(全十卷) 49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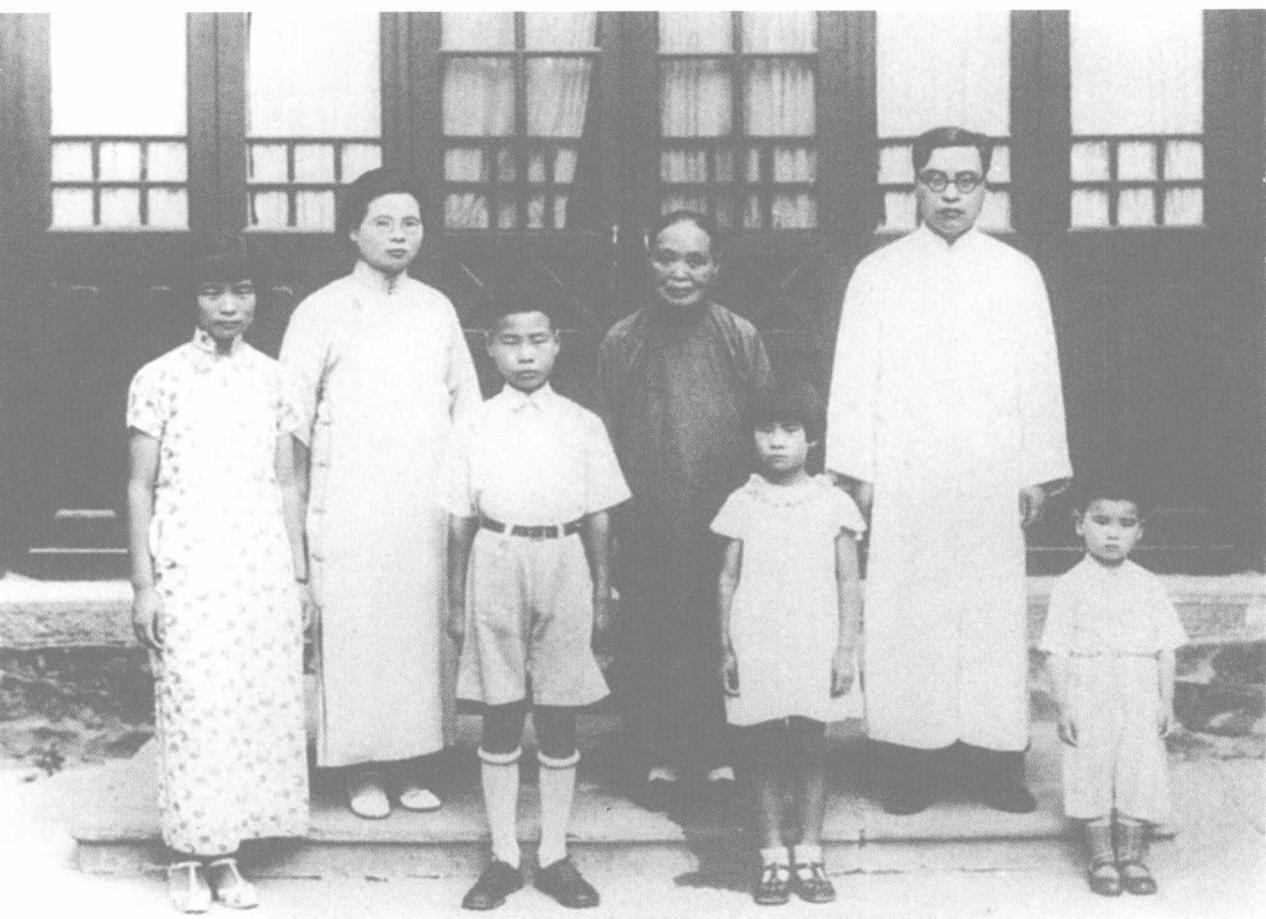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431—87923413



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和夫人任载坤。



1935年，母亲吴清芝返回河南老家前，全家在清华大学乙所院中合影。中为吴清芝，右为冯友兰，左为任载坤。前排左起为钟琏、钟辽、钟璞、钟越。

目 录

自序一	001
自序二	002

第二篇 经学时代

第一章 泛论经学时代	005
第二章 董仲舒与今文经学	008
第一节 阴阳家与今文经学家	008
第二节 阴阳家思想中之宇宙间架	009
第三节 董仲舒在西汉儒者中之地位	011
第四节 元，天，阴阳，五行	012
第五节 四时	014
第六节 人副天数	017
第七节 性情	018
第八节 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	020
第九节 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	023
第十节 灾异	027
第十一节 历史哲学	028
第十二节 春秋大义	032
第三章 两汉之际谶纬及象数之学	037
第一节 纬与谶	037
第二节 所谓象数之学	038

目
录

第三节 阴阳之数	040
第四节 八卦方位	042
第五节 卦 气	044
第六节 孟喜，京房	045
第七节 音律配卦	049
第八节 其他纬书	050
第九节 阴阳家与科学	053
第四章 古文经学与扬雄、王充	054
第一节 “古学”与刘歆	054
第二节 扬 雄	055
第三节 王 充	062
第五章 南北朝之玄学上	071
第一节 玄学家与孔子	071
第二节 何晏、王弼及玄学家之经学	072
第三节 阮籍、嵇康、刘伶	078
第四节 《列子》中之唯物论及机械论	082
第五节 《杨朱篇》中放情肆志之人生观	083
第六章 南北朝之玄学下	090
第一节 向秀与郭象	090
第二节 独 化	091
第三节 宇宙间事物之关系	093
第四节 天然及人事之变化	095
第五节 “无为”	096
第六节 圣 智	098
第七节 “逍遙”	101
第八节 “齐物”	103
第九节 “至人”	106
第七章 南北朝之佛学及当时人对于佛学之争论	108
第一节 中国佛学与中国人之思想倾向	108

第二节	佛家与道家	109
第三节	“六家七宗”	111
第四节	僧肇所讲世界之起源	116
第五节	僧肇之不真空义	118
第六节	僧肇之物不迁义	119
第七节	僧肇所说之圣人	120
第八节	僧肇之般若无知义	121
第九节	道生之顿悟成佛义	122
第十节	当时对于神灭神不灭之辩论	128
第八章	隋唐之佛学上	132
第一节	吉藏之二谛义	132
第二节	玄奘之《成唯识论》	134
第三节	法藏之《金师子论》	150
第九章	隋唐之佛学下	161
第一节	天台宗之《大乘止观法门》	161
第二节	慧能，神会，宗密	172
第十章	道学之初兴及道学中“二氏”之成分	189
第一节	韩 愈	189
第二节	李 翱	191
第三节	道学与佛学	195
第四节	道教中一部分之思想	196
第五节	道教中之科学精神	198
第十一章	周濂溪，邵康节	200
第一节	周濂溪	200
第二节	邵康节	205
第十二章	张横渠及二程	216
第一节	张横渠	216
第二节	程明道与程伊川	226

第十三章 朱子	243
第一节 理, 太极	243
第二节 气	248
第三节 天地人物之生成	250
第四节 人物之性	253
第五节 道德及修养之方	256
第六节 政治哲学	258
第七节 对于佛家之评论	260
第十四章 陆象山、王阳明及明代之心学	263
第一节 陆象山	263
第二节 杨慈湖	267
第三节 朱陆异同	269
第四节 朱子以后之理学	272
第五节 陈白沙与湛甘泉	273
第六节 王阳明	274
第七节 王龙溪及王心斋	286
第十五章 清代道学之继续	290
第一节 汉学与宋学	290
第二节 颜李及一部分道学家	290
第三节 戴东原	299
第十六章 清代之今文经学	310
第一节 清末之立教改制运动	310
第二节 康有为	311
第三节 谭嗣同	316
第四节 廖平	322
第五节 经学时代之结束	328
附录一 第二篇 第五章 异文	329
附录二 审查报告三	346

自序一

此书第一篇出版后，胡适之先生以为书中之主要观点系正统派的。今此书第二篇继续出版，其中之主要观点尤为正统派的。此不待别人之言，吾已自觉之。然吾之观点之为正统派的，乃系用批评的态度以得之者。故吾之正统派的观点，乃黑格尔所说之“合”，而非其所说之“正”也。

吾作此书，见历史上能为一代之大儒自成派别者，其思想学说大多卓然有所树立，即以现在之眼光观之，亦有不可磨灭者。其不能自成派别者，则大多并无新见，其书仍在，读之可知。于是乃知，至少在此方面言，历史中之“是”与“应该”，颇多相合之处。人类所有之真、善、美，历史上多予以相当的地位。其未得相当的地位者，则多其不真真、不真善、不真美者也。吾虽未敢谓此言无例外，然就历史之大势言，则固如此也。

此第二篇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处其境，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值此存亡绝续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觉当如人疾痛时之见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无错误者，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无论其派别为何，而其言之字里行间，皆有此精神之弥漫，则善读者可觉而知也。“魂兮归来哀江南”；此书能为巫阳之下招欷？是所望也。

第二篇中，采用师友之说及承师友指正之处，仍均随文注明。兹乘此书出版之机会，谨致谢意。

冯友兰

二十二年(1933年)六月

自序二

此书第一篇出版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全书出版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距今已十余年矣。在此十余年中，吾之思想有甚大改变。假使吾今日重写《中国哲学史》，必与此书，大不相同。然所以不即重写者，一因写历史书必须“无一字无来历”。战时播迁，需用书籍不备。再因近来兴趣，自中国哲学史转至中国哲学及哲学。此三者或多混为一谈，而实则并非一事。因此之故，改弦更张，势所不能。惟全书出版后，陆续写有《原儒墨》、《原儒墨补》及《原名法阴阳道德》三篇，刊入《中国哲学史补》；又与张可为君同写有《原杂家》一篇，此四篇论先秦诸家之起源，可补此书所未备。又写有《孟子养气章解》，了解《孟子》，亦为此书所未及，故并列入附录，以备读者之参考。又吾最近对于中国哲学之了解，见于最近写成之《新明道》（一名《中国哲学之精神》）一书，亦可备读此书者之参考。

冯友兰

三十三年（1944年）四月

第二篇

经学时代

第一章

泛论经学时代

普通西洋哲学家多将西洋哲学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时期。此非只为方便起见，随意区分。西洋哲学史中，此三时期之哲学，实各有其特别精神、特殊面目也。中国哲学史，若只注意于其时期方面，本亦可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时期，此各时期间所有之哲学，本亦可以上古、中古、近古名之。此等名称，本书固已用之。但自别一方面言之，则中国实只有上古与中古哲学，而尚无近古哲学也。

谓中国无近古哲学，非谓中国近古时代无哲学也。盖西洋哲学史中，所谓中古哲学与近古哲学，除其产生所在之时代不同外，其精神面目，亦有卓绝显著的差异。在西洋哲学史中，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①等，建立哲学系统，为其上古哲学之中坚。至中古哲学，则多在此诸系统中打转身者。其中古哲学中，有耶教中之宇宙观及人生观之新成分，其时哲学家亦非不常有新见。然即此等新成分与新见，亦皆依傍古代哲学诸系统，以古代哲学所用之术语表出之。语谓旧瓶不能装新酒，西洋中古哲学中，非全无新酒，不过因其新酒不极多，或不极新之故，故仍以之装于古代哲学之旧瓶内，而此旧瓶亦能容受之。及乎近世，人之思想全变，新哲学家皆直接观察真实，其哲学亦一空依傍。其所用之术语，亦多新造。盖至近古，新酒甚多又甚新，故旧瓶不能容受；旧瓶破而新瓶代兴。由此言之，在西洋哲学史中，中古哲学与近古哲学，除其产生所在之时代不同外，其精神面目，实有卓绝显著的差异也。

上篇谓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在经学

^① 冯先生原作为“亚力士多德”，今据流行译名，全书改为“亚里士多德”。——编者注



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其所见亦多以古代即子学时代之哲学中之术语表出之^①。此时诸哲学家所酿之酒，无论新旧，皆装于古代哲学，大部分为经学之旧瓶内。而此旧瓶，直至最近始破焉。由此方面言之，则在中国哲学史中，自董仲舒至康有为，皆中古哲学，而近古哲学则尚甫在萌芽也。

盖人之思想，皆受其物质的精神的环境之限制。春秋战国之时，因贵族政治之崩坏，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皆有根本的变化。及秦汉大一统，政治上定有规模，经济社会各方面之新秩序，亦渐安定。自此而后，朝代虽屡有改易，然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皆未有根本的变化。各方面皆保其守成之局，人亦少有新环境、新经验。以前之思想，其博大精深，又已至相当之程度。故此后之思想，不能不依傍之也。

不过在此时代中，中国思想，有一全新之成分，即外来异军特起之佛学是也。不过中国人所讲之佛学，其精神亦为中古的。盖中国之佛学家，无论其自己有无新见，皆依傍佛说，以发布其所见。其所见亦多以佛经中所用术语表出之。中国人所讲之佛学，亦可称为经学，不过其所依傍之经，乃号称佛说之经，而非儒家所谓之六艺耳。

中国人所讲之佛学，为中国思想界中之新成分，宋明时代之经学家亦引之入经学。故谓中国无近古哲学，非谓在中古、近古时期中，中国思想，全无新成分，亦非谓此后中国哲学家，全无新见。历史之时间，绝不容人之常留于完全同一情形之内。即自汉以后，讲孔子，讲老子，讲庄子，以及讲其他古代哲学家之哲学者，其理论比孔子等原来之理论，实较明晰清楚。其理论所依据之事实，亦较丰富。新见解亦所在皆有。上篇所说历史是进步的(第一篇第一章第十一节)，现在仍完全可适用。此等哲学家之新见，即此后之新酒。特因其不极多，或不极新之故，人仍以之装于上古哲学，大部分为经学之旧瓶内。因此旧瓶又富于弹性，遇新酒多不能容时，则此瓶自能酌量扩充其范围。所以所谓经者，由六而增至十三，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受宋儒之推崇，特立为“四书”，其权威且压倒原来汉人所谓之六艺。即中国人所谓佛学，其中亦多有中国人之新见。盖中国人与印度人之物质的精神的环境皆不同。故佛学东来，中国人依中国之观点，整理之，选择之，解释之。在整理选择解释之时，中国人之新见，随时加入。此即中国人在此方面所酿之新酒也。然亦因其不极多或不极新之故，故仍以之装于佛学之旧瓶内，而旧瓶亦能容受之。即如禅宗之学说，在佛学中为最革命的，亦为最中国的，然仍须托为“教外别传”之说，明其为佛之真

^① 西洋与中国之中古哲学所用古代哲学中之术语，亦可有新意义。然中古哲学家有新意义而不以新术语表出之，此即以旧瓶装新酒也。

意，此亦以旧瓶装之也。故中国之佛家，其精神亦为中古的，其学亦系一种经学。

中古、近古时代之哲学，大部分须于其时之经学及佛学中求之。在中古、近古时代，因各时期经学之不同，遂有不同之哲学；亦可谓因各时期哲学之不同，遂有不同之经学。此经学及佛学中之各宗派，多各有其独盛之时代。盖上古子学时代之思想，以横的发展为比较显著；中古、近古经学时代之思想，以纵的发展为比较显著。故本书第一篇所包括之历史时间，不过四百余年；而第二篇所包括，则及二千余年。此亦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间之一差异也。就中国历史上政治情形言之，思想上亦应有此现象。盖古代政治未统一，而自秦汉以后，中国政治则以统一为常也。

直至最近，中国无论在何方面，皆尚在中古时代。中国在许多方面，不如西洋，盖中国历史缺一近古时代。哲学方面，特其一端而已。近所谓东西文化之不同，在许多点上，实即中古文化与近古文化之差异。此亦非由于中国人之格外不长进，实则人之思想行为之改变，多为适应环境之需要。已成之思想，若继续能适应环境之需要，人亦自然继续持之；即时有新见，亦自然以之比附于旧系统之上；盖旧瓶未破，有新酒自当以旧瓶装之。必至环境大变，旧思想不足以适应时势之需要；应时势而起之新思想既极多极新，旧瓶不能容，于是旧瓶破而新瓶代兴。中国与西洋交通后，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各方面皆起根本的变化。然西洋学说之初东来，中国人如康有为之徒，仍以之附会于经学，仍欲以旧瓶装此绝新之酒。然旧瓶范围之扩张，已达极点，新酒又至多至新，故终为所撑破。经学之旧瓶破而哲学史上之经学时期亦终矣。

第二章

董仲舒与今文经学

第一节

阴阳家与今文经学家

本书第一篇谓古代所谓术数中之“天文”、“历谱”、“五行”，皆注意于所谓“天人之际”，以为“天道”人事，互相影响。以后所谓阴阳家皆即此意推衍，将此等宗教的思想加以理论化(第七章第七节)。阴阳家，于其成“家”之时，即似有与一部分儒家混合之趋势。盖孔子对于古代传下之术数，本似仍有相当之信仰。故因“凤鸟不至河不出图”，而叹“吾已矣夫”。又曰：“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天人之际”，孔子固亦重视之也。司马迁于《孟子荀卿列传》中，兼及驺衍之学说，谓：“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是驺衍亦讲儒家之学也。《荀子·非十二子》篇，谓子思孟轲，“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今《孟子》书中，无言及五行之处，或者其后阴阳家之语，有混入“孟氏之儒”之学说中者，故荀子为此言也。及至秦汉，阴阳家之言，几完全混入儒家。西汉经师，皆采阴阳家之言以说经。所谓今文家之经学，此其特色也。当时阴阳家之空气，弥漫于一般人之思想中。“天道”人事，互相影响；西汉人深信此理。故汉儒多言灾异。君主亦多遇灾而惧。所谓三公之职，除治政事外，尚须“调和阴阳”。陈平谓文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遂万物之宜者也。”丙吉问牛喘，以为“三公调和阴阳；今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因暑而喘，则时节失气，有所伤害”(自汉儒多言灾异下，详见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三公除负政治上之责任外，尚须负自然界中事物变化之责任。故汉时遇有灾异有策免三公之制。此在今所视为奇谈，而在西汉阴阳家空气弥漫之时代，则一般人皆视为当然之事也。